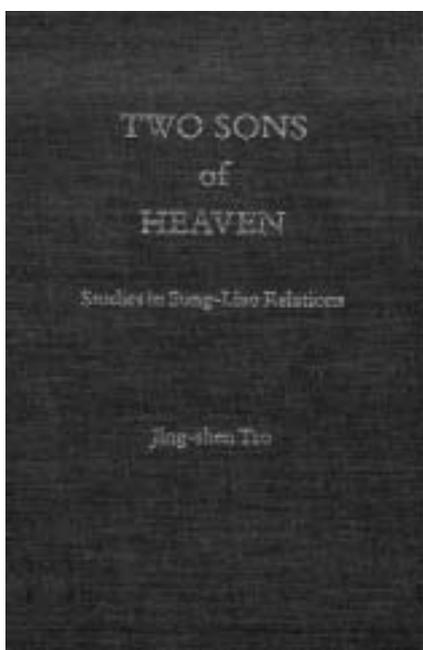


## 天朝外交抑或平等外交？

● 趙善軒



Jing-shen Tao,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8).

—

二戰以後，美國學者對中國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以哈佛學派的影响力最為顯著。該學派提出的「天朝外交論」、「挑戰與回應

論」以及「現代化論」等論述，逐漸成為主流學術範式。其中，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早期提出以天朝觀念及朝貢制度來說明傳統中國的外交模式，認為傳統的中外關係是建基於「中國中心主義」和「中國人的優越感」之上，並稱之為「中國的世界秩序」，最為深入人心。

雖然「天朝外交論」主要在於闡述十八世紀以前的情況，並過份強調「傳統中國」的塑造，但由於費氏享有崇高的地位，此說隨即在學術界及政界廣泛流傳，慢慢產生了認為傳統中國一直是實行所謂的天朝外交的印象，良久未消。然而，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哈佛學派所建立的學術範式開始受到質疑，當中包括「天朝外交論」在內。魏而思 (John E. Wills) 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學者研究中國外交史普遍存在嚴重的偏見，他透過探討十七世紀末的中荷關係，指出1660至1670年間中荷關係並非建立在朝貢制度，而是建立在實際的商業和政治考慮之上，以此修正「天朝外交論」的謬誤 (John E. Wills,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22-1681* [Cambridge,

費正清早期提出以天朝觀念及朝貢制度來說明傳統中國的外交模式，令人產生傳統中國一直是實行所謂的天朝外交的印象。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這些哈佛學派學術範式開始受到質疑。如魏而思指出十七世紀末的中荷關係並非建立在朝貢制度，而是實際的商業和政治考慮之上。譚中認為明朝貢制度只是中國及鄰近地區之間的一種習俗，不能視為真正的外交制度。

陶晉生的《天之二子：宋遼關係研究》深入探討宋遼外交關係。陶氏雖非開宗明義反對「天朝外交論」，但本書根據大量史料所作的論述，卻達到修正因「天朝外交論」而造成的對傳統中國外交的誤解。本書最大的貢獻莫過於考察了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並提出早在漢、唐時期就曾經以「平等外交」模式與外族共處，而宋遼時期更徹底體現了「平等外交」模式。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204)。稍後，譚中更明確否定「天朝外交論」，認為朝貢制度並不真正的存在，只不過是費氏概念化的觀點，譚氏根據史實說明朝貢制度只是中國及鄰近地區之間的一種習俗，不能視為真正的外交制度，更認為十八世紀的中英關係，絕不能以納貢關係來形容 (Chung Tan,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 [1840-42]*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 1978], 21)，他又指出傳統中國也非輕視或排斥對外貿易 (同上，頁25-30)，以此來反駁費氏以文化因素及貿易戰爭解釋鴉片戰爭的爆發，其認為戰爭純粹是由英國單方面挑起所致 (同上，頁222)。

隨着西方學者研究的深化及掌握中國史料能力的提高，現今已開始對這些流行數十年之久的學術範式作出全面反思，並認為這些學術範式多是出於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視西方的經驗為定律，忽略了實際的歷史發展。本文無意全面檢討費氏及美國漢學界的中國外交史研究，只希望為讀者提供應有的背景，以便以下討論。

## 二

陶晉生的《天之二子：宋遼關係研究》(*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下引此書只註頁碼)一書，便是在上述背景下成書。其不但沒有受到已有學術範式的局限，更利用大量史料，深入探討宋遼外交關係。陶氏雖非開宗明

義地舉起反對「天朝外交論」的旗號，而事實上本書亦借用過費氏相關的研究 (頁4)，但本書根據大量史料所作的論述，卻達到修正因「天朝外交論」而造成的對傳統中國外交的誤解。本書最大的貢獻莫過於考察了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並提出早在漢、唐時期就曾經以「平等外交」模式與外族共處，而宋遼時期更徹底體現了「平等外交」模式。

全書共173頁，除了序言及附錄外，本書共分為九章，第一章主要講述古代中國的對外關係，集中說明「平等外交」在歷史上的出現及實踐；第二章討論澶淵之盟對北宋之影響，提出盟約符合北宋的實際利益，並為兩國帶來和平的局面；第三章是關於遼國對北宋的貿易與政策的研究，分析貿易政策對北方局勢的影響；第四章乃講述北宋朝野人士對契丹形象的描繪，指出北宋朝野人士中有兩種南轅北轍的看法，一種是基於「漢族中心主義」，視契丹為北方蠻族；另一種則是根據實際情況，主張建立「平等外交」，以南北朝的態度對待。第五章則以微觀角度研究十一世紀中期北宋對遼的具體政策，指出北宋成功運用以夷制夷的策略經略遼夏，化解邊疆危機。第六章集中討論王安石時期的對遼政策，說明王安石對遼態度的前後變化。第七章討論宋、遼、高麗之間的外交關係，探討宋遼兩國如何爭取高麗以增加其在外交及戰略上的籌碼。第八章分析了北宋聯金滅遼的策略，認為此乃貫徹北宋以夷制夷的方略，但因宋人對金缺乏了解而導致災難性的失敗。第九章則為全書的總結。

## 三

或許有人認為，北宋自立國初即面對嚴重的外憂內患，以致不能實踐「天朝外交」，實屬特殊例子，不能以此作為修正費氏的範式。下文將利用本書的論點及其他新近的研究成果來說明陶氏「平等外交論」的合理性及其對於中國傳統歷史的代表性。

陶氏指出，中國自商周以來，一直存在着外族對華夏民族的威脅，而華夏民族又因文化上的優勢，漸漸形成了一種文化優越感，鄙視華夏文明外圍的夷狄。到了漢武帝時期，中華帝國大力開疆拓土，一度建立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頁2-3)。但另一方面，陶氏又指出，兩漢有很長時期，漢與匈奴的外交實際上是建立在平等外交的基礎上，還利用和親政策來鞏固雙方關係。到了唐代，唐與突厥和吐蕃的關係在相當長的時期裏也屬於平等關係，他分別利用魏徵及陸贄唐初及晚唐的言論，指出唐代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相當的彈性，主要是基於全盤局勢的考慮。漢唐被稱為盛世，實行平等外交，很大程度是基於實際的國際形勢而制定(頁4、8、9)。至於中國內部分裂時期，就如三國時期，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政策也甚具彈性(見謝偉傑：〈孫吳「彈性外交」述論〉，《漢學研究》，第二十二卷第一期[2004]，頁21-46)，而五代時期，則可稱為多元的國際關係時期(頁7)，故宋遼關係很大程度受此影響。

宋遼關係是在公元974年(宋開寶七年，遼保寧六年)正式建立，

雙方都指是對方先發起建交的。兩國之間定期有使者往來，並有一定的規格，雙方享受着短暫的和平局面。直至宋真宗時期，兩國爆發大戰，戰爭最終以訂立和約結束，雙方締結了澶淵之盟，雖然日後歲幣數量有所修訂，但有關係約成為了兩國關係百多年的長期外交基礎。

過去許多學者都以「先南後北」、「強幹弱枝」、「重文輕武」及「積弱」等概念，解釋北宋在軍事上不能凌駕於遼，並把澶淵之盟視為北宋國力不振的結果。然而，近年已有學者指出「積弱」等概念不足以解釋宋初的局面(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梁偉基：〈先南征，後北伐：宋初統一全國的唯一戰略(960-976)?〉，《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十一期[1999]，頁73-101)，假若受到這些先入之見囿限，我們就很難認清當時宋遼之間的實際情形。以往學者研究宋遼關係時，往往過份強調北宋的「積弱」，但若反觀遼國，他們經歷過長時期的發展，到十世紀末，契丹人所建立的王朝已非往日北方塞外民族般鬆散，而是一個具有嚴密政治、軍事制度的「征服王朝」。宋遼兩國乃兩個實力相近的政權，兩國的外交關係建立在對等的基礎上的說法，是有其合理性的，並非單以「積弱」就能解釋。

其次，遼與西夏之處境不一樣，西夏早在建國前就臣服於宋，但遼卻早於北宋立國，當時更已成為北亞的一股強大勢力(頁10)，而宋仍集中精力於統一中國本部，在客觀環境促使下，在兩國的立場而

陶晉生指出，自商周以來，華夏民族一直因文化上的優勢，鄙視華夏文明外圍的夷狄，漢武帝時期一度建立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但另一方面，兩漢有很長時期，漢與匈奴的外交是建立在平等外交的基礎上。到了唐代，唐與突厥和吐蕃的關係在相當長的時期裏也屬於平等關係。而五代時期，則可稱為多元的國際關係時期，故宋遼關係很大程度受此影響。

以往的論述往往把北宋對外不振歸咎於北宋軍事「積弱」，認為北宋建都汴京，欠缺像長安及洛陽的地理防禦優勢，導致遼對宋構成直接軍事威脅。但事實上中國的軍事發展到了晚唐、五代已出現巨大變化，其中以軍人職業化影響最為深遠。宋代無可避免地採用職業軍人制度，而自唐初以來糧食、物資已日漸缺乏的長安、洛陽自然不適合容納大量職業軍人，故汴京是最適合的地點。

言，建立「平等外交」，是形勢所使然。

以往的論述往往把北宋對外不振，歸咎於北宋軍事「積弱」，認為北宋建都於汴京，欠缺像古都長安及洛陽的地理防禦優勢，因而造成遼對宋構成直接軍事威脅，被稱為「城下之盟」的澶淵之盟即由此而來。事實上，中國的軍事發展到了晚唐、五代已出現巨大變化，其中以軍人職業化影響最為深遠。宋代建國，結束了五代的混戰，加上面對北方強大的對手，難以返回兵農合一的業餘軍制，故無可避免地採用職業軍人的制度，而自唐初以來糧食、物資已日漸缺乏的長安、洛陽自然不適合容納大量職業軍人，故汴京是最適合的地點。北宋原承襲唐末及五代以來的高風險戰略文化（即野戰導向），但由於當時戰事規模擴大，自公元979年的滿城會戰後，即由高風險的「前沿防禦」轉為較保守的「彈性防禦」，因此宋遼的戰場由純粹的沿邊地區轉化為廣大的北宋境內（《經略幽燕》，頁165-89）。後來宋軍轉採「縱深防禦」（同上，頁243-69）戰略，即使遼國軍隊可進逼至北宋的政治核心地區（即京師附近），但所面對的風險極高，而且傷亡率也大大提高，當然北宋亦須付出地方州郡經濟受到破壞的代價。傳統看法認為北宋建都於汴京致使遼對宋構成直接的軍事威脅，實際上是對當時的軍事戰略文化不甚了解所致。由此可見，「平等外交」模式並非完全是出於北宋軍事「積弱」，實在是因宋遼兩國國力相當，足以分庭抗禮，「平等外交」是合乎客觀形勢的產物。如上文

所言，宋遼關係並非歷史上罕見的例子，漢與匈奴、唐與突厥和吐蕃都曾存在長期對等的外交關係，故平等外交在傳統中國實有其代表性。

#### 四

本書提出「平等外交」這一概念有相當的貢獻，然而本書亦非無可爭議的，本書書名*Two Sons of Heaven*，這不免令人聯想到「天無二日，人無二主」的說法，雖然書中指出宋遼之間是以南北並稱，但事實上遼國是屬於中國以北的政權，是東北亞的帝國，不屬於北宋時期的中國體系。以「天無二日」來形容分裂時期的國內局勢比較適合，而用於宋遼關係明顯與歷史事實不符，更與本書所述的國際關係並不一致，作者以此為書名未免有點畫蛇添足。儘管如此，仍不損本書的整體價值及貢獻。

如上所言，本書所提出的「平等外交」是基於當時的實際形勢，故有其合理性的。上文又曾經提及漢、唐兩代亦有「平等外交」的例子，由此可以說明費氏「天朝外交論」實不足以全面解釋傳統中國的外交模式。其實，朝貢外交早在漢武帝時已經出現，及至明太祖時期朝貢外交與國際貿易始完整地結合起來（見鄭永常：〈明太祖朝貢貿易體制的建構與挫折〉，《新亞學報》，第二十二卷（2003年），頁457-98），故十七、十八世紀西方人來華貿易，才會被視為「朝貢體制」之內，故不能視之為傳統中國的常態。姑

勿論「天朝外交」是否適於用明清時期的中國。以一時期的外交政策而推之為是中國的傳統，在方法上已經失之公允。

總而言之，無論「平等外交」抑或「朝貢體制」，都是來自不同時代的產物，中國傳統外交實屬多元模式，既有以朝貢令外國稱臣的模式存在，亦有像漢與匈奴、唐與突厥、宋與遼般的對等關係出現。可

以說一切都是根據實際的國際形勢而調整的。故費氏的「天朝外交論」實不適用於形容不同時代的中國外交模式，本文提出以「彈性外交」來說明傳統中國的外交模式。所謂「彈性外交」，即是說傳統中國外交乃基於當時國情及國際形勢而制定，並不囿於既有的模式，具有相當的彈性。以此說明傳統中國的外交模式，顯然較合乎實際的歷史發展。

## 圖片來源

封面 焦小健：《一杯涼茶》。

封二上 楊參軍：《居家事物》。封二文字：金觀濤。

封二中 章曉明：《西湖之二》。

封二下 焦小健：《撫摸》。

頁33、63、107、109、130 資料室圖片。

頁44、45 劉小軍攝。

頁81上 焦小健：《神聖的坐姿》。

頁81下 楊參軍：《居家事物》。

頁82左上 焦小健：《馬來畫家蕭先生》。

頁82左下、右上 楊參軍：《居家事物》。

頁82右下 章曉明：《西湖之四》。

頁83左上、左下、右上、右下 章曉明：《西湖遠眺》、《西泠橋》、《孤山》、《西泠印社》。

頁84 章曉明：《四季家園之二》。

頁85 焦小健：《城市風景》。

頁86上 楊參軍：《居家事物》。

頁86下 章曉明：《西湖之一》。

頁95 王邦憲攝。

頁135 薩維尼著，許章潤譯：《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封面。

頁145 王東傑：《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北京：三聯書店，2005），封面。

頁149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北京：三聯書店，2005），封面。

頁153 Jing-shen Tao,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8), cover.

封三、封底 焦小健：《綠傘、狐狸狗、小高》、《吳山大觀——清晰》。

##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5年10月號、11月號

第43期 2005.10.31

鍾霞 蘇南農村抗美援朝運動

羅平漢 「雙百」方針1957年被中斷的原因

潘德昌 遺華日僑問題的歷史學思考

孔凡義 中國的革命與現代化

卿文輝 從大陸—農業文明與海洋—商業文明的視角看台灣問題

楊轟 趙樹理：在正典化與狂歡化之間

唐小兵 《孔雀》、姐姐與亞細亞痛苦的消解

葛兆光 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還是在歷史中理解民族國家？（全文版本）

第44期 2005.11.30

楊俊 析「文革」初期毛澤東對待鄧小平微妙的政治態度

宋玉波 當代西方政黨政治發展的新趨勢

任晶晶 東亞多邊安全機制：中國的困難與選擇

梁木生、王紅衛 我國行政區劃整體改革初探

陳林 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非營利化、非國有化與市場化互不矛盾

姚禮明 《聖經》與現代大學教育的歷史淵源

陳偉軍 被放逐的邊緣話語——解讀建國初期文壇有關同人刊物的言說

段煉 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深層影響：追蹤紐約與東京的南宋山水畫

宋洪兵 如實估計中國古代歷史文化——評劉家和先生新著《史學、經學與思想》

段西寧 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與天皇制的問題——評赫伯特·比克斯著的《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